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十七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 朱德总司令在山西

张雪琴  
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领导人朱德委员长，在革命战争的烽火年代，曾和山西解放区军民共同战斗，结下了鱼水深情，在山西进行的革命实践，树立的不朽丰碑，将彪炳千秋。



25

5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张 熔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17辑)

朱德总司令在山西

张雪琴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25 字数:300千字

2005年12月第1版 2005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362-73-8

G·34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领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李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刀
雷忠勤	霍润德			

## 目引子

### 录

引子	.....	(1)
一、东渡前夕	.....	(1)
二、挺进山西	.....	(6)
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	(14)
四、跃马太行建奇功	.....	(22)
五、指挥反顽斗争	.....	(31)
六、忠于统一战线的伟大功臣	.....	(37)
七、老百姓眼中的朱德总司令	.....	(50)
八、春寒料峭过晋绥	.....	(57)
九、重返故地视察工作	.....	(60)

## 引子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党、军队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德，在革命战争的烽火年代，他曾经两度踏上过三晋大地，和山西解放区军民共同战斗、生活了两年半多时间，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中后期，他又带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亲切关怀，重返故地，先后3次来山西进行工作视察。在三晋这块古老的热土上，深深留下了人民军队伟大统帅的光辉足迹。一代伟人和山西人民结下的鱼水深情，在山西进行的革命实践、树立的不朽丰碑，将彪炳千秋，永远给三晋儿女以巨大的鼓舞和推动力。

### 一、东渡前夕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此为标志，日本帝国主义轰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炮火，在中华大地上揭开了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的光辉篇章。

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特别是“八·一三”上海沦于敌手，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倡议，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并即将开赴华北前线实行对日抗战。

作为红军和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从“七·七”事变到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战场前夕，以一颗赤胆忠心，怀抱对党、对红军、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历史使命感，日夜操劳、殚精竭虑，为红军出征对敌抗战，进行了大量而艰辛的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即7月8日，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发表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一天，朱德和毛泽东及其他红军将领联名致电驻守平津地区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将领宋哲元等，明确指出：“日寇进攻，全国震愤，卢沟桥之役，二十九军英勇抵抗，全国闻风，愿为后盾。敢乞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不让日寇侵占祖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红军将士，义愤填膺，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13日，朱德和毛泽东召开延安共产党员和各机关工作人员会议，发出“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去的号召。7月14日，朱德和毛泽东电令红军各部：限10天内完成各项抗日准备工作，听候出动命令。就在这一天，壮怀激情的朱德，为红军开赴抗日前线，挥笔写下了英雄豪迈的誓词：

“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复图占外蒙，又侵我  
于华北，非灭亡我全国不止。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  
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  
丰功

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朱德则针对蒋介石的所谓“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的论调，撰写了《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发出了感人肺腑之言：

“和平已到了绝望时期，困难已到了最后关头！现在，摆在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黄帝子孙面前的问题，只有对日本强盗实行抗战，从二十九军的抗战走向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抗战，抗战到底！”

7月29日和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战局日趋严重。在此情况下，蒋介石要求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8月初，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往。8月11日，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发言，就对日抗战的战略战术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然要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

“当时，蒋介石虽然希望红军早日参战；但仍在红军改

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设置种种障碍，不肯承认红军的独立地位。”而在8月13日，当日本侵略军突然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把战火烧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心的时候，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原来的错误主张，同意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设立统一的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据此，朱德决定提前离开南京，于8月19日返抵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以加紧进行红军改编工作。第二天，即8月20日，他和彭德怀率红军全体指战员发布《留别西北同胞书》、《为东下抗日告同胞书》和《告抗日友军将士书》。在对红军的改编和出动迅速作了部署后，朱德即于8月22日赶赴洛川县冯家村出席中共中央在这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洛川会议”上，朱德曾多次发言，主张红军早上前线，“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使用兵力，发动人民群众，开展广大的抗日游击战争。“洛川会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等11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副主席）。会议结束后，中央军委于8月25日正式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名为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称后为正、副总司令），叶剑英、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林彪、聂荣臻为正、副师长；第一二〇师，以贺龙、萧克为正、副师长；第一二九师，以刘伯承、徐向前为正、副师长。为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于8月29日决定，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由朱德、彭德怀

等9人组成，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同日，朱德、彭德怀向全国发表就任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通电，坚决宣称：“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表示愿“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这时，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作为抗日的先遣队，已于7天前由陕西三原出发，向晋东北抗日前线挺进。

随着第一一五师的胜利开拔，第一二〇师也于9月3日踏上了东渡抗日的战斗征程。9月2日，朱德出席了第一二〇师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举行的抗日誓师大会。在大会上，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号召全体指战员到敌人后方去，把华北广大民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抗战；要求每个将士严守纪律，亲密团结，英勇作战，誓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

送走第一二〇师之后，朱德率八路军总部亦开始出征了。

出发的前一天，即9月5日，朱德以刘钟的化名特地写了一封家信，寄给四川的亲属。这是他10年来第一次写家信。信中说：

“久别甚念。我以革命工作累及家属，本属常事。但不知你们竟受到何等程度，望你接信后将十年情况告我是荷。理书、尚书（分别为朱德二哥、大哥之子——引者）、宝书（朱德之子朱琦——引者）等在何处？我两母亲（朱德生母和养母——引者）是否在人间？你的母亲及家属如何？统望告。近

来，国已亡三分之一，全国抗战已打了月余，我们  
的队伍已到前线，我已动身在途中。对日战争，我  
们有信心并有把握打胜日本。如理书等可到前线  
上来看我，也可以送他们读书。我从没有过一文  
钱，来时需带一些钱来我用……。”

信虽很短，但在字里行间不仅充分反映了一个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真挚亲情，而且反映了一个伟大民族英雄的必胜信念和高尚情怀。

## 二、挺进山西

第一二〇师出征后的第四天，即1937年9月6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也向山西前线挺进了。出发前，在云阳镇的大操场上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大会由邓小平主持，朱德则领着全体指战员一字一句地大声宣读《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

不：谨此宣誓。”出征的队伍有总部机关、特务团，还有随营学校的3个团。在朱德、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的带领下，指战员们开始在濛濛的细雨中行进了。

9月16日，朱德一行到达韩城县芝川镇。芝川镇是陕西入晋的重要渡口，当朱德等从这里渡过黄河后，便踏上已经燃烧着战火的三晋大地，开始投入了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斗争。

这时，华北抗战危机的局面已经出现。日本侵略军按照其“一个月拿下山西全省，三个月灭亡全中国”的战略计划，采取“两翼箝制，中央突破”和“右翼迂回”的战略方针，正在全面进攻华北的同时，集中主要兵力加紧会攻山西，且已进占北边的天镇、阳高、大同和东边的广灵、浑源，开始把恒山山脉当作侵吞冀、察、晋三省的“战略中枢”夺取，造成向山西纵深进击的态势，致使太原的形势已危如累卵。而阎锡山指挥下的第二战区的国民党军队，如同其他战区的国民党军队一样，已经钝挫锐气，丧失战斗能力，根本无法阻滞日军的战略进攻。

东渡黄河的第一站，便是山西省荣河（今万荣）县境。从这里出发，朱德一行徒步100公里于9月20日进抵晋南重镇侯马后，即乘坐火车，于9月21日清晨到达山西省会太原。紧接着，朱德又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之邀，由已在太原并和阎锡山谈判过的周恩来陪同，前往雁门关附近的代县太和岭口前线指挥部，与阎锡山会谈。会谈是在周恩来、彭德怀和阎锡山谈判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会谈比较

顺利。阎锡山允许八路军驻区的群众工作由八路军负责；不好的县长可以更换；允许给游击队发枪；还允许在八路军工作地区实行减租减息。阎锡山也要求八路军帮他抵抗向山西进攻的日军。”会谈结束后的9月23日，朱德即赶到已进驻五台县南茹村的八路军总部，并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了会谈的情况。

上一年东征时就对红军留下绝好印象山西人民，今天听说改编为八路军的红军又开来山西，实行对日抗战，没不欢呼雀跃，一路上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八路军的拥戴，对朱德总司令的崇敬。“在过去对于红军有过深刻印象的山西人民，如今能亲眼看看这支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开上抗日前线，自然感到无限的兴奋。八路军渡过黄河，沿同蒲路北进，直到原平下车。这一路上所过的城镇、车站、村庄，没不遇到广大群众扶老携幼的夹道欢呼。我们有一列兵车，过太原时，已在深夜十二时，而大批男女群众，特别是东北的流亡学生，都拥挤在车站上，整夜不眠地欢送八路军上前线。”“火车在吕梁山东麓、汾河东岸向北开进，沿途的车站越来越多地站满了欢迎的人群。无论商人、学生、工人、农民，都拼命往前挤，要看看红军——八路军的朱总司令。朱总司令的四川话人们听不懂，但看到那位向人们招手的长者，衣着和别的军人一样，脸色比别人黑一点，像常年辛劳的庄稼汉，面容纯朴，慈祥……人们便以喜悦的神情、亲切的语言，表明自己的感触：八路军的总司令不像国民党军队的长官，老百姓是可以亲近的！这，便是一个伟大的开端，像一座桥使八路军和人民的无穷力量相连接起来。”

国民党军队奉行片面抗战路线，在敌人面前或一触即溃，或闻风而逃，并到处散布恐日情绪，危害人民，造成抗战危局；八路军则在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下，向北挺进，迎战日寇，力挽抗战危局。从这两幅不同图画所形成的显明对比中，广大人民群众更觉八路军最可信赖，并迫切期待尽快对日作战，取得胜利。“但是，八路军能不能战胜日本侵略军？有些人因为看到八路军的武器装备比较差，心里还存在着疑问。就是共产党和八路军内部也有人感到不是很有把握，因为面对的敌人是过去没有交过手的，有大炮、飞机、坦克等现代装备的日本侵略军。朱德却信心十足。他综合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对战争作出全面的、客观的分析，制定了相应战略战术。他认定、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不可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他们对地形不熟悉，对山地作战的训练也不够。虽然武器装备比较好，但武器不是万能的，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发挥其力量；同时，它也有可以被制服的方法。再加上日本是小国，兵员和经济力量都有限。因此，他坚定地认为‘日本并不是那么可怕的魔鬼’，我们能够打败日军。”有鉴于此，朱德和周恩来、彭德怀，决计尽快寻机歼敌，在山西先打一个大胜仗，以杀灭日本侵略军的骄狂气焰，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进一步扩大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这一仗，就选在了平型关。

平型关位于繁峙县东北边，紧接灵丘县境，系古长城上的重要隘口。古称瓶形寨，金称平型镇，清称平型岭关，后称平型关。关前有一条公路，蜿蜒于群山之中，通向灵丘、涞源，地势险要。会攻山西日军的东条英机察哈尔兵团、板垣

征四郎第五师团，于9月中旬分别侵占大同和广灵、浑源、灵丘后，又以追击之势，继续南犯、西侵。板垣师团主力一部兵临平型关下，东条兵团主力一部则陈兵于雁门关附近。但由于雁门关有第二战区国民党军队扼守难以从正面攻夺，所以板垣师团便倾其全力首先进击平型关，东条兵团予以策应，图谋突破平型关后，由东向西从侧背夺取雁门关，以打开进取太原的门户，并沟通山西和冀、察、绥3省的联系。9月23日，阎锡山急电朱德，称昨夜间，日军突然奇袭平型关阵地，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朱德接电后，便和彭德怀立马电令正向平型关一带开进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应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但须控制一部于灵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右侧。”并且将第一一五师出击平型关的情况，电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第一一五师于9月24日深夜冒着倾盆大雨向平型关以东急进，并在拂晓前抢占了通向平型关的公路两侧的高地，设下了埋伏，决心在这里打响首战告捷的第一枪。骄横万端的板垣，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先头部队第二十一旅团及其辎重竟陷入八路军设下的“口袋阵”里，且有1000余官兵当即变成了孤魂野鬼，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成了八路军的战利品。这一天，是9月25日。9月25日的平型关大捷，是在朱德和彭德怀的部署下，八路军出征抗战以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谱写了中国抗战的新篇章。正如朱德指出的：

“八路军入晋后，开始平型关的巨大胜利，给

混乱溃败的战局，以初步的稳定，兴奋了山西、华北以至全国人民，给日本帝国主义长驱直入，一往无敌的气焰，减杀不少。敌人领略了平型关惨败的血的教训后，使他原来大规模的长距离的战略迂回与放肆的急进，不得不改为集结主力的正面推进”。

捷报传开，举国欢腾。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地无分东西南北、国内海外，人无分男女老幼、阶级阶层，每一个热爱中华的炎黄子孙，每一个真正“龙的传人”，都从八路军“克敌扬威”的胜利中，激起了希望，立起了信心，鼓起了斗志。全国各地向八路军致敬、慰问的电报、函信像雪片似地飞来。毛泽东于10月1日高兴地致电在南京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博古、叶剑英，指出：“我们捷报发至全国，连日各省祝捷电甚多，其中有蒋介石、杨虎城、马鸿逵、范长江、龙云、孙蔚如，上海大公报、上海职业就国会，杭州、福州、湖北、广东、陕西、开封各省党部，武汉行营，开封绥靖公署，浙江、福建各省政府，浙江抗日后援（救国）会等。”

为尽快攻夺太原，日军中央部于10月初命令板垣师团实行太原攻略战。著名的“忻口战役”，就是中日双方为坚守和攻夺太原而展开的一场大战、恶战，也是国共两军合作抗战的光辉范例。

整个战役由国民党军队在正面阻击，八路军则展开于敌之翼侧和后方，即以第一一五师为右路军，广泛开展于晋东北，并向察南、冀西出击，直至推进到平汉路两侧地区；以一二〇师为左路军，坚持战斗在忻县、（今忻州）、崞县（今

属原平)、雁门关至大同一线。当沿正太路西犯之敌进逼娘子关,与忻口之敌对太原形成钳击之势时,第一二九师主力直抵平定地区,驰援娘子关;随后,又和晋东北南移的第一一五师主力协同作战,展开于昔阳至寿阳一线。由于平型关大捷对国民党官兵的巨大鼓舞,所以当忻口战端一开,便进入与敌人顽强拼搏状态,以至伤亡官兵万人以上,前敌总指挥、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将军壮烈牺牲,血洒疆场。而八路军部队在朱德和彭德怀的部署下,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20多天的激战中,连续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大同至忻口之日军交通线,取得了井坪镇、雁门关、王董堡、冯家沟、广灵至灵丘、阳明堡、七亘村、黄崖底、沾尚至广阳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作战。

代县阳明堡飞机场,是敌空中突击力量的集结地。当日军地面攻击受挫后,即由阳明堡机场频繁出动飞机,加紧对忻口阵地狂轰滥炸。此时,第一二九师先头部队第三八五旅陈锡联之第七六九团已开赴山西前线,暂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朱德和彭德怀即将其部署在阳明堡、崞县之间,并于10月15日致电友军李默庵部,透露了准备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的意图,要求李部抽出一部兵力,协同作战,以便“相机破坏其飞机场”,“袭其降落之飞机而焚毁之”。10月19日夜,陈锡联团打响战斗,以1个小时的凌利攻势,干脆利索地结果了24架飞机和100余日军的性命,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次袭击战斗虽然付出了以赵崇德营长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但它却为八路军创造了抗战中第一次摧毁敌机场的光辉战例,使急欲突破忻口而直趋

太原的日军，丧失了空中突击力量和生命线，严重地钳制了敌人的进攻，极大地援助了忻口阵地的国民党守军。

还是在平型关大捷之前的9月17日，毛泽东针对日军采取的以“大迂回”姿势包抄太原的战略计划，就改变原定的八路军集中于一点的战略部署，实施新的多点活动的战略部署，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于被动地位”。要求八路军各部准备分别转到晋西北的管涔山脉地区、晋西南的吕梁山脉地区，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将来依情况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区。6天之后的9月23日，毛泽东就此再次电告八路军总部，深入阐明了山西应划分为四个战略区和八路军部队由此实行分散配置的重大战略意义，强调指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在电示中，毛泽东除部署晋东北之五台山脉和晋西北之管涔山脉外，还对“距敌尚远”的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与吕梁山脉之晋西南，亦提出了“作适当之部署”的要求。据此，朱德和彭德怀、任弼时在原有分兵部署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作出分散配置的部署，实施大规模的战略展开，即：第一一五师一分为二，聂荣臻率一部，留五台山地区，创建以晋东北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抗日